

山东旧志存录京杭运河文献述略

周广骞

提 要：山东是京杭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也是方志纂修大省。在对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的存世数量及文献来源等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可以从运河漕运、运河工程、运河经济、运河文化、运河文学5个方面，对山东方志存录的运河文献进行专题论述，并探讨方志运河文献在保存细节化和具象化素材、展现当地运河整体风貌、进行文献辑佚与校勘等方面的特殊价值。

关键词：山东 方志 京杭运河 文献

山东是京杭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同时也是方志纂修大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山东方志541种，占我国存世方志的6.5%，仅次于四川、浙江，居全国第三位。山东今存最早方志为元代于钦所撰《齐乘》，其余方志均为明代以来纂修。明清两代山东建制之沿革，与相关方志纂修关系颇为密切。明代山东运河自济南府属德州桑园镇入境，在山东境内主要经过东昌府属聊城、堂邑、博平、茌平、临清州、恩县、武城，兖州府属滕县、峄县、鱼台、济宁州、嘉祥、东平州、东阿、阳谷、寿张，上述各府、州、县存世方志共17种。清代山东运河自德州罗家口进入山东，主要经过济南府属德州，东昌府属恩县、清平、聊城、堂邑、博平，泰安府属东阿、东平州，临清直隶州属武城、夏津，兖州府属阳谷、寿张、汶上、滕县、峄县，曹州府属巨野，济宁直隶州属嘉祥、鱼台，上述府、州、县存世方志共88种；民国时期，京杭运河山东段淤塞不通，相关地域方志存世15种，山东运河所经地域存世方志合计120种。今以上述方志存录的京杭运河文献为对象，稍加论述如下。

一 山东方志存录京杭运河文献的来源及含义

方志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卢中岳称：“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历史性资料。”^①梁耀武认为，方志价值功用和历史地位的取得，主要来自其资料性。资料性决定着志书的体例结构和编修方式，资料性的强弱关系到志书编纂的成败。^②运河所经地域纂修的方志往往收录较多与运河有关的文献资料。仓修良称：“大运河所通过的各府、县，所修方志对于运河或漕运记载总是特别详细……这些内容，非运河沿岸的府、州、县志，自然就不会有记载了。”^③笔者认为这些论述均颇为准确精当。

在封建社会运河漕运是重要的货运方式，历代统治者均非常重视。自京杭大运河开通以来，特别是明代之后，漕粮均通过运河北运京师，漕运成为明、清王朝维持其封建政权的经济命脉。弘治六年（1493）二月，明孝宗在命刘大夏治理张秋决河的敕书中指出：“朕念古之治河，只是除民害；今之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益非细故……”^④清代统治者亦非常重视漕运，

① 卢中岳：《地方志史话》，《人民日报》1961年11月19日，第4版。

② 参见梁耀武：《论地方志是一方资料全书》，《玉溪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③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79页。

④ 林芑修，马之驩纂：康熙《张秋志》卷9《艺文志》，康熙九年（1670）刻本。

“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①，“不容稍有亏缺”^②，时刻给予密切关注。京杭运河漕运重要性与维护运河畅通复杂性的交织，引起上自朝廷、下至治河官员的高度重视。此外，运河作为交通大动脉，又对南北人员、物资流动及沿运地区经济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复杂影响。

山东运河是京杭运河的重要河段，地形复杂，水源不足，治理任务繁重，随之产生的各类与治河有关的文献数量巨大、类型丰富，涉及面也比较广。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历代正史、政书等历史类文献中的山东运河文献。《元史》《明史》及《清史稿》中均有《河渠志》，对山东运河开挖、修治多有记述；在《食货志》中有对山东运河漕运及商品流通的记述，在《职官志》中有对山东治河官职设置的记述。我国的典志体史书，如“九通”“十通”等大多设有食货、地理、田赋、征榷等门类，保存了不少山东运河文献。明清时期选录“经世之文”汇集而成的《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在户部、工部两大类之下的漕运、仓储、商税等条目中，也保留了不少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政论性文章。此外，在《明实录》《清实录》中也保存了不少山东运河资料，以明清历代帝王上谕为主，散编于各年之下，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二是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水利水文著作中的山东运河文献。明清存世的水利水文著作主要涉及治黄、疏河、通漕等多个方面，其中不少即为治河官员所作，如万恭《治水筌蹄》、李化龙《治河奏疏》、胡瓚《泉河史》、王宠《东河志》、叶方恒《山东运河备考》、陆燿《山东运河备览》等。三是元代以来文人笔记和诗文集集中的山东运河文献。我国历代文人创作了大量笔记、随笔、记录，内容广泛，不拘体例。明清时期，不少官员、文人经过运河往返于京城和南方各地，或在运河沿线地方任职，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随时记录下来。这些笔记大多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如李东阳《南行稿》、谢肇淛《小草斋集》、谈迁《北游录》、宋起凤《稗说》等。据统计，明代诗文集存世数千种，清代诗文集存世达4万余种，^③内容涉及山东运河的开挖、漕运的维护及运河区域社会的方方面面。^④

总体来看，京杭大运河自元代通航以来，对山东运河沿线地域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方志的资料性决定了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必然大量采录与当地运河有关的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东方志存录的运河文献，是种类庞杂、内容丰富的各类山东运河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官员、文人创作的与山东运河有关的实用类、文学类文献的地域性汇集。山东方志中收录的运河文献并非专为山东方志而创作，而是方志纂修者从运河与当地关系出发，利用现成的相关文献，按照方志的编纂体例，加以搜集、移录和编排的。这些与运河有关的文献，往往散见于方志各部类，资料数量巨大，记述细致，且不乏第一手原始文献，值得认真梳理和挖掘。

二 山东方志存录运河文献的类别

运河对所经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全方位的影响，涉及面相当广泛。运河本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运河文献内容和类型的多样性。反映在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中，其所收录的运河文献内容也非常丰富。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

① 范承谟：《请改折漕粮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26，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宏文阁铅印本。

② 《清宣宗实录》卷284“道光十六年六月壬申谕内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37册，第389页。

③ 参见张可礼：《别集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④ 参见李泉：《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一是山东方志运河漕运类文献。山东境内沿运府州县均负有漕粮收贮、转运等务，漕运职责较重，漕务较为繁杂，相关记述亦较为详细。如德州为明清时期漕粮贮存和转运重地，其卷7《政事》“漕政”部分记述德州漕仓情形，相关内容可与卷5《建置》之“仓库”目所记相补充。如其“广积仓”条称：“明永乐九年会通河告成，十三年于陵州仓故址建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以备淮、徐、临、德起运南粮赴通，运军递换，暂驻于此。”^①从漕仓角度论述明清漕粮运输方式之变迁，颇有价值。山东方志中关于运河漕运的记述同样包括漕运官署和官员的内容，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4《建置二》“巡漕使院”称：“巡漕使院旧在南池，今在草桥之东，赁民居。前《志》载沈廷芳《南池使院诗》，入艺文。”^②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3《田赋》列“仓庾秩官表”，分“户部督储分司”“临清仓大使”“广积仓大使”上下3栏，分别加以列举，不仅列其籍贯，且注明其任职时间，内容颇为详细。

二是山东方志运河工程类文献。山东运河通航条件较差，修治任务繁重，在山东沿运河地区方志中，保存了大量与运河工程有关的文献。康熙《张秋志》卷9《艺文志一》“河工碑记”集中收录了弘治之后与治理张秋决河有关的碑记，如徐有贞《治水功成题名记》详论历代治水之方，而尤其推崇王景：“惟景之堰流分水，颇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于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终汉世无河患。方之于彼，其特善乎？”^③此外，该志还收录了毕瑜《按察副使陈公政绩碑》、徐溥《安平镇治水之碑》、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分别记述了陈政、白昂、刘大夏等人主持治河的过程。治理运河、保障漕运，都需要设立职官，定责修治。关于官署的记述多见于《建置志》，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4《建置志》“公署”条即记述了管河州判署、总督河院署、运河道署、运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管河主簿署、南阳闸官署等衙署，对衙署沿革及建筑规制专门记述。关于职官的记述多见于《职官志》，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6《职官志》先以表格形式列出各官职名称及担任此职官员的姓名简历，其《职官志》“宦迹”又为与山东运河有关的各级官员作传，其中如宋礼、金纯、陈瑄等人的传记内容详细，而尤重于其治河经历，具有较高价值。

三是山东方志运河经济类文献。运河是贯穿南北的物资交流大动脉。为弥补漕军生计及运粮脚价之不足，朝廷允许漕船北上时搭载一定数额的土宜沿途贩卖，并免抽税。“总计商船运输及漕船的货运，起码自明代中后期始，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当已超过其漕粮运输量，清代更胜于明代。”^④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沿岸众多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如乾隆《德州志》卷4《疆域》“市镇”条，记述了德州因运河航运而兴盛的历程：“明洪武初，州治在河西，永乐九年移州治于卫城。招集四方南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万历四十年御河西徙，浮桥口立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⑤不仅详细记述德州有关街市名称及方位，而且说明了漕船带货对当地商业的影响。随着京杭运河经济的繁荣，各类商品流通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自明代即开始在运河上设卡收税。乾隆《临清直隶州志》专设《关榷志》，并分设关本末、关署、口岸、税额临砖附、户部榷税分司表三、工部营缮分司表二6个条目。其中“口岸”条

① 王道亨修，张清源纂：乾隆《德州志》卷5《建置》，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② 徐宗幹修，许瀚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4《建置二》，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③ 林芑修，马之驥纂：康熙《张秋志》卷9《艺文志一》。

④ 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⑤ 王道亨修，张清源纂：乾隆《德州志》卷4《市镇》。

记述南水关、北桥口、魏家湾口、樊村厂口等口岸,“税额临砖附”记述明弘治之后税额变化,颇能据此考见运河商业兴衰。

四是山东方志运河文化类文献。运河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流通,而且影响到沿岸地域的文化。从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情况来看,运河对当地的影响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对民风民俗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张秋是山东运河沿线的繁华市镇,道光《东阿县志》卷2《方域》“张秋风俗”称:“张秋在河上,五方杂厝,风俗不纯,仰机利而华侈,与邑人绝异。”^①乾隆《兖州府志》卷5《风土》称:“夫自府以西南,济、郛、巨野、嘉祥、金乡、鱼台,皆泽国也……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吴、楚之货毕集其中,一名都也。河道军门屯重兵其上,兵使部郎佐之。五方之会,鹜于纷华,与邹、鲁间稍殊矣。”^②济宁为河道总督驻地,且河湖交错,治河保漕任务繁重,刺激了金龙四大王、晏公等运河水神和航运保护神的出现和传播,与运河有关的祠庙颇多。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之二《秩祀志》记述龙神庙、五龙宫、漕河神庙、禹王庙、河神总祠、金龙四大王庙等,且均明确标明所处位置、修建人员及供奉神祇、相关修造祠庙碑记,实为研究河神信仰的重要文献。运河祠祀不仅祭祀神灵,而且为治河名人修建祠堂,以时祭祀。乾隆《兖州府志》卷20《祠祀》之“宋尚书祠”条称:“在分水龙王庙西。明永乐初,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开会通河,即以金纯、周长配,春秋致祀。皇清雍正四年诏封宁漕公。”^③

五是山东方志运河文学类文献。诗文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文学体裁。这些作品有的记述行程,有的咏志抒怀,有的写景状物,有的怀古伤今,有的记述交游,内容相当丰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著录运河文学类文献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为集中收录于方志《艺文志》中。如康熙《临清州志》卷4《艺文》收录丘潜的《过会通河有感》诗:“清江浦上临清闸,箫鼓丛祠饱馐余。几度会通河上过,更无人说宋尚书。”^④将丛祠的繁盛与治河名臣宋礼身后的萧条加以对比,抒发了功臣业绩难免被时光流水无情冲刷的感慨之情。其二为散见于方志各卷相关条目及内容之下。如乾隆《东昌府志》卷7“山水”目记述御河(按,即卫河)后,以双行小字移录袁桷《发御河诗》、吴师道《九月初旬临清下陵州舟中诗》、郑善夫《卫河集别》、顾绍芳《舟行纪事》等诗,对御河条目进行补充。再如乾隆《夏津县志》卷10《艺文志》收录王世贞《卫河》二首:“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那比下江船,扬帆忽不见。”“前望渡口驿,行之轻相隔。非关驿路移,应是依心迫。”^⑤句式短小,用语清新,抓住生活中看似平淡、实则传神的场景,颇有江南民歌之韵。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感情真挚,对于了解元代以来山东运河及士人思想状态,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三 山东方志存录运河文献价值略析

山东方志中的运河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多样,是进行山东运河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资料。总体来看,山东运河文献和其他与运河有关的著作相比,具有独特价值,是进行运河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资料。

① 李贤书修,吴怡纂:道光《东阿县志》卷2《方域》,道光九年(1829)刻本。

② 觉罗普尔泰修,陈顾联纂:乾隆《兖州府志》卷5《风土》,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③ 觉罗普尔泰修,陈顾联纂:乾隆《兖州府志》卷20《祠祀》。

④ 于睿明修,胡悉宁纂:康熙《临清州志》卷4《艺文》,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⑤ 方学成修,梁大鲲纂:乾隆《夏津县志》卷10《艺文志》,乾隆六年刻本。

（一）山东方志存录的运河文献是对沿运府州县运河风貌的整体展现。山东方志对运河的记述往往以辖地为界，涉及河道工程开挖与维护、漕粮收贮与运送、运河管理机构 的设置、治河人物生平、沿运商业发展、运河诗文收录等方面，形成对一地运河风貌的整体化记述，具有较强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首《天章志》详载清代康熙、乾隆二帝经过济宁时所作诗作；卷2《山川志》细分为泉源、河渠、湖渚、漕运、桥梁等细目，记述与运河水源有关的境内泉源及河渠情形；卷3《食货志》之“赋役”目记述济宁直隶州所属各县交纳漕粮款目，《风土志》之“风俗”目记述济宁一带受运河影响的民风；卷4《建置志》记述管河州判署、总督河院署、运河道署、运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等与运河管理有关衙署的设置情况；卷5《秩祀志》记述济宁运河沿岸漕河神庙、河神总祠、金龙四大王庙等祠庙情况。同卷《名胜志》记述太白酒楼、南池等地方名胜；卷6《职官志》列出河东河道总督、运河道、运河同知、泉河通判、济宁州判、鱼台主簿等各级治运治漕各级官员职官表，并为潘叔正、宋礼、金纯、周长、蔺芳、杨方兴、朱之锡、靳辅、完颜伟等著名治河人物立传；卷9《艺文志》收录与济宁运河有关的大量诗文，其中不乏张养浩、杨士奇、王世贞等名人名作。此外，方志还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相关州县受运河影响而形成的地域特色，如临清自明正统四年（1439）起，即为山东境内唯一运河钞关，乾隆《临清州志》卷7《关榷志》记述临清税关的设置及发展脉络，并按年夹录相关文献。如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条下移录胡悉宁《豁免土税碑记》，对减税保商情形进行详细记述。由此可见，山东运河丰富的内容在方志中得到全方位的展现。这既是运河涉及面广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方志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一地整体风貌的文献特色。

（二）山东方志存录的运河文献保留了沿运府州县与运河有关的大量细节化素材。史书和运河专书较少以某一府州县境内运河为记述对象，其记述范围较广，内容亦较为粗略。相对而言，府州县志特别是县志因记述范围较小，对辖区的记述往往比较详悉。“其所记载，虽不出提封四境之中，实足补国史之所未尽。”^① 编修县志不仅要充分利用与当地有关的文献，且多会进行较为深入的采录和调查，这些都是其他类型文献所不具备的。如康熙《临清州志》详述临清清初街市巷厂情况，今据以制作表格如下：

清康熙初临清街市巷厂统计表

类别	名目	数目
街	司前、州前、帅府、户部、钞部、小仓、新开三、永清、太平、磨盘、草店、板井、酱棚、茶叶店、斜、侯村、济武、冰窖	18
市	米、柴、马、猪、牛、鸡、鹅、饭、青碗、线子、小、菜、锅	13
巷	果子、白布、琵琶、钉子、故衣、纸马、白纸、大宁、跶鼓、宁海、竹竿、鞍子、手帕、香、井亭、打狗、窑冶、毛袄、曲、油篓、皮、弓、豆腐、马尾、箍桶、粳米、土坯、碾子、礼拜	29
厂	席、板、炭、石灰、南、砖	6

说明：本表据康熙《临清州志》（清抄本）卷1《村市》编制

① 梁钟亨修，路大遵纂：民国《清平县志》卷首《序》，民国25年（1936）铅印本。

而自晚清漕运停止后,外地商人纷纷外迁,临清街市亦日趋衰败。民国《临清县志》记述民国时期临清城市面貌称:“按城内街市,当全盛时代,人烟辐辏,有毂击肩摩之势。自经兵燹,元气不复,劫烬之余……若西门内三两人家,已不成其为街市,北门之内则白骨如莽,瓦砾苍凉,过其地者,不胜今昔之感焉。”^①不论是清代临清之兴盛,还是民国临清之衰败,其相关记述非得自目睹,不能如此详悉。再比如,峰县因运河所经,商业相当繁荣。光绪《峰县志》卷7《物产略》称:“当乾嘉盛时,江浙湖广诸行省漕粮数千艘,皆道峰境北上,商旅岁时往还不绝,而奇物珍货衍溢,居民皆仰之以贍身家。而本地所有麦豆及煤炭诸物亦得善价,而行銷数千里。”在回顾运河航运盛时之后,遂述及当时情形云:“洎道咸之变,漕运中废,重以关税厘之腹削,商贾疑畏,于是外货不进,内货不出,而峰之生计乃大困。”^②这些记述对了解清末运河停漕对峰县的影响,亦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这些资料均仅保留在当地方志中,实为运河盛衰对山东沿运地方影响的个案化记述。

(三) 山东方志存录的运河文献具有较高的辑佚与校勘价值。方志具有较强的资料性,方志的编纂者往往将与本地有关的文献倍加记述,不厌其详。所保存的大量文献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辑佚和校勘价值。

山东方志存录运河文献的辑佚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水利文献的辑佚。方志纂修者多为地方官员,往往收录与治理辖境运河有关的基层公文。这些公文大多仅收录于方志中,其文献价值颇值得重视。如冯振鸿所修乾隆《鱼台县志》卷13《艺文志》收录其所作《请开南阳岔河议禀》《勘荆山河议禀》,均为其担任鱼台知县时呈报上宪的公文。《请开南阳岔河议禀》请求开运河广运闸下东南岔河,以使牛头河水得以宣泄。《勘荆山河议禀》指出荆山河“上接微湖,下通漕运,盖济、鱼、滕、沛四境湖水之尾闾也”,请求及时疏浚,以导河水入运。此二禀首尾完整,为清代鱼台县境运河水利工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地方诗文作品的辑佚。方志重视当地文献,收录了不少乡邦诗文作品,颇可以补耆旧文献之遗佚,在保存明清诗文作品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9之三《艺文志》收录戴沂《晚秋泛蜀山湖》诗:“九月衣单制薜萝,消愁鲁酒倚高歌。数丛菰米沉寒水,几处霜风折败荷。嘹唳声凄云外雁,汀洲秋老岸旁莎。木兰荡漾斜阳晚,又见归樵带笠过。”^③戴沂,济宁人,为郡诸生,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7《学校志》“州学宫”条称:“(康熙)二十五年,州人戴沂等植槐、桧、侧柏、桐、杏等树百余株。”^④据此可知,戴沂为热心乡邦事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当地士人,其他情况尚难知悉。此诗仅保留在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中,蜀山湖为山东运河重要的补给水源,此诗文笔清丽,写景生动,感情亦颇为真挚,对了解清代前期士人的思想与志趣提供了值得研究的个例。

山东方志存录运河文献的校勘价值也值得重视。如文天祥抗元失败,被逮北上,其记录山东行程之诗作颇多。《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许氏藏明刊本《文山先生全集》卷14收录《来平馆》一诗。文天祥北上途中所作诗多以地名为题,如《汶阳馆》《发东阿》《宿高唐州》等,而此“来平馆”颇难理解。今检光绪《东平州志》卷20亦录存文天祥此诗,题为“东平馆”。由此诗“萧条古郛州”之句,可知此时文天祥所经之地为古之郛州。按《元和郡县志》卷11《河南道》

① 张自清修,张树梅、王贵笙纂:民国《临清县志》卷2《建置志》,民国23年(1934)铅印本。

② 王振录修,周凤鸣纂:光绪《峰县志》卷7《物产略》,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③ 徐宗幹修,许瀚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9《艺文》。

④ 潘守廉修,袁绍昂、唐烜纂: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7《学校志》,民国16年铅印本。

六“郛州”条称：“秦为薛郡地，在汉为东平国……大业三年罢，州为东平郡。隋乱，陷贼。武德五年，讨平徐圆朗，于今郛城县置郛州。”^① 北宋宣和元年（1119），改郛州为东平府。据此，则郛州始设于隋代，其中续有因革，至北宋中改东平府。文天祥称所经之地为“古郛州”，则实为东平无疑。故此诗当题作《东平馆》，而《文山先生全集》所题之“来”当因与“東”字形相似，因而致误。再比如，明代罗玘“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据高树，或闭坐一室，瞑目隐度，形容灰槁，自此文益奇”^②。其所撰《圭峰集》卷26《送张祐之监德州仓》称：“玉浮暑池歌，金泥秋篱菊”，颇为费解。今检乾隆《德州志》卷12《艺文》亦收录此诗，其“泥”字作“泛”，意在描绘篱边丛生金菊之美。据此，则可就乾隆《德州志》所录此诗以校罗玘《圭峰集》之误。

由以上论述可知，山东作为京杭大运河纵贯的重要省份，其沿运河地域明清以来纂修的方志存录了大量与当地运河有关的基础文献，保存了许多与运河修治、漕运管理有关的奏折、条例及诗文；同时还注重实地考察，对当地经济状况、城市风貌、民俗信仰、诗文创作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记述。这些文献或得自乡邦士人之稿本，或得自刍尧农夫之口耳，或得自各级官府之册簿与公文，或得自纂修者之经历与目击，大大丰富了山东方志对运河的记述，是山东运河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资料。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汶川特大地震青川抗震救灾志》出版

青川县人民政府组织编纂的《汶川特大地震青川抗震救灾志》，历经近10年艰辛编纂，于2018年7月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志为青川县历史上首部针对重大事件的专题性志书。

《汶川特大地震青川抗震救灾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设自然地理环境与地质构造、地震灾情、抢险救灾、灾民安置、医疗卫生防疫、赈灾、灾后重建、浙江援建、其他援建、青川人民的感恩情怀、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11章66节，共180万字，全面、客观、真实反映了地震灾情下青川人民自强自立、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以“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两幅标语”精神为主线，用广泛、翔实的图文资料全面、真实记述、反映青川县的地震成因、震情、灾情、抢险救灾（各地自救）、灾民过渡安置、卫生防疫、赈（济）灾和灾后重建（浙江援建、精神家园重建），以及青川人民感恩情怀等方面情况。志书着重记述了关于青川县城几经规划迁建后，仍原址重建并最终建成国家AAAA级景区的过程和浙江援建者的“五干”精神、辉煌的援建成果以及青川人民浴火重生的感恩之情。

（青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①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11，“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木活字本。

② 《明史》卷286，中华书局，1974年，第7344页。